

文史知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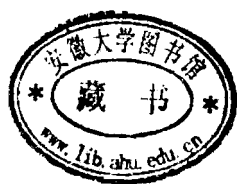
周勋初 著



凤凰出版社

文史知新

周勋初 著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文史知新 / 周勋初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5506-1555-7

I. ①文… II. ①周…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
究—文集 IV. ①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19698号

- | | |
|---------|--|
| 书 名 | 文史知新 |
| 著 者 | 周勋初 |
| 责 任 编 辑 | 王华宝 |
| 出 版 发 行 |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025-83223462 |
| 集 团 地 址 |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
| 集 团 网 址 | http://www.ppm.cn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
| 经 销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 照 排 |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
| 印 刷 |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南京市六合区冶山镇,邮编:211523 |
| 开 本 | 880×1230毫米 1/32 |
| 印 张 | 10.75 |
| 字 数 | 289千字 |
| 版 次 | 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
| 标 准 书 号 | ISBN 978-7-5506-1555-7 |
| 定 价 | 38.0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25-57572508) |

“全唐五代诗研究丛书”编纂缘起

《文史知新》内收入了周勋初先生的许多重要论文，本拟编成集子后随即问世，恰值其时江苏古籍出版社为周先生出版文集，因而改变了计划。今为方便读者购置计，凤凰出版社（即原江苏古籍出版社）决定推出新版。考虑到周勋初先生担任第一主编的《全唐五代诗》这一重大项目的成果即将面世，而他有关这一课题的几篇重要论文分散在其他集子里，今乃将《叙〈全唐诗〉成书经过》一文从《文史探微》中移入，将《御定〈全唐诗〉的疏误和〈全唐五代诗〉的编纂》一文从《无为集》中移入。后文是为1996年参加“两岸古籍整理学术研讨会”而撰写的，对此课题的历史发展论证颇详，凡此均可供学界参考。

自2011年起，周勋初先生在《古典文学知识》上连载治学经验谈多篇，其中的第四篇《乘势发展，及时总结——漫谈机遇问题》介绍他进入唐诗研究领域的经过，也与《全唐五代诗》有关，对年轻学者更有启发意义，今亦附入本书。

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为了配合《全唐五代诗》的编纂与出版，决定编辑一种“全唐五代诗研究丛书”，并列入国家“985工程”研究与资助项目。鉴于《文史知新》中有关《全唐五代诗》的四篇文章在理论与实践上均曾起到重要作用，今即将此书列为丛书的第一本著作。南京大学古典文学专业的治学方针是，在文献学的基础上产生高水平的研究著作；南京大学古籍所的有效措施是，通过古籍整理项目的锻炼来培养高素质的人才，今日我们仍然一如既往地秉持这一宗旨。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我们欢迎参加《全唐五代诗》这一重大项目而产生的著作源源不断地进入这一丛书系列之中。

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

2012年9月

目 录

释“赋”	(1)
赋体评议	(6)
王粲患麻疯病说	(20)
左思《三都赋》成功经验之研讨	(25)
郭璞诗为晋“中兴第一”说辨析	(38)
《西京杂记》中的司马相如赋论质疑	(56)
论谢灵运山水文学的创作经验	(65)
《易》学中的两大流派对《文心雕龙》的不同影响	(80)
“登高能赋”说的演变和刘勰创作论的形成	(95)
潘勖《九锡》与刘勰崇儒	(108)
评刘勰文学观的双重标准	(121)
《文选》所载《奏弹刘整》一文诸注本之分析	(134)
魏晋南北朝时文坛上的摹拟之风	(145)
魏晋南北朝时科技发展对文学的影响	(153)
李白剡中之恋放谈	(169)
元和文坛的新风貌	(179)
韩愈的《永贞行》以及他同刘禹锡的交谊始末	(195)
“三教论衡”与文士心态	(212)
“芳林十哲”考	(227)

宋人发扬前代文化的功绩·····	(238)
叙《全唐诗》成书经过·····	(252)
季振宜《唐诗》的编纂与传流·····	(273)
御定《全唐诗》的时代印记与局限·····	(291)
御定《全唐诗》的疏误与《全唐五代诗》的编纂·····	(306)

附录

乘势发展 及时总结

——漫谈机遇问题·····	(329)
---------------	-------

释 “赋”

“赋”这个词，在我国古典文学中经常运用，它有多种不同的涵义，因此在理解上常滋纷扰。《汉书·艺文志》引《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指的是春秋时期政治交往中的赋诗风气；班固《两都赋序》：“赋者，古诗之流也。”指的是一种文体；《毛诗序》：“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指的是一种写作手法。——三者名同实异，不能混为一谈。《文心雕龙·诠赋》篇中说：“《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昔邵公称：‘公卿献诗，师箴赋。’《传》云：‘登高能赋，可为大夫。’《诗序》则同义，传说则异体，总其归涂，实相枝干。”意在折衷群说，融会贯通，但却缺少应有的疏理，不免流于笼统。后代有人继续作过钻研，只是三者之间的关系仍未说清楚，因而对此还有再作探讨的必要。

总的看来，赋诗风气对赋体的产生和赋这一手法的形成确有关系，不过中间还有许多曲折的过程，需要作些论证，才能阐明其间演变的经过。

春秋之时有赋诗的风气，《左传》中屡见记载，下面举昭公十六年的一次赋诗为例：

郑六卿饯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邦志。”子蠡赋《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产赋郑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太叔赋《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太叔拜，宣子曰：“善

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终乎。”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箜兮》，宣子喜曰：“郑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旼起，赋不出郑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数世之主也，可以无惧矣。”宣子皆献马焉，而赋《我将》。子产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乱，敢不拜德！”

这样的赋诗，简直像猜谜，好在彼此都有这方面的特殊修养，因而能够做到心照不宣，非但不发生误会，反而联络了感情。郑六卿赋的大都是情诗，韩宣子却领会到它是“皆昵燕好”的表示；反之，宣子的答辞，郑六卿也能默契于心。酬答之间都显得很机智。

根据民俗学者的研究，世界上各古老民族无不重视谜语，我国古代也不例外。《国语·晋语五》载“秦客廋辞于朝”，韦昭注：“廋，隐也；谓以隐伏谲诡之言问于朝也。”这种好隐的风气，先秦各国皆然，尤以齐、楚二国为最，《韩非子》、《吕氏春秋》、《史记》、《新序》、《列女传》等书中屡见记载。《新序·杂事》篇曾记齐宣王“发‘隐书’而读之”，《汉书·艺文志》载《隐书》十八篇，颜师古注引刘向《别录》云：“隐书者，疑其言以相问，对者以虑思之，可以无不论。”说明好“隐”就是喜欢猜谜。这种玩艺与赋诗在本质上是一回事。

时人认为通过制谜与猜谜可以测度对手的智力，从而推断该人其他方面的表现。猜谜实际上是一种智力测验。秦客设廋辞，目的在测验晋国大夫的智力，从而推断他们的政治才能。和这一样，通过赋诗酬答，也可以测验从政者的智力。因此，凡是应答如响的政治家，就能给本国争取光荣，例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晋公子重耳至秦国求助，子犯自知水平差，不敢当此大任，改荐赵衰应付，结果果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一些不能应付赋诗酬酢的人，就会给本国带来耻辱，例如《左传》昭公十二年记宋华定聘鲁，因为不知对方赋诗用意，又不答赋，结果被人断为昏庸“必亡”。这就说明赋诗言志之事确与国家体面有关。因为卿大夫智力的高下会直接影响到一国政治的盛衰，所以《汉书·艺文志》上说它可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从这里也就可以了解到儒家中人为什么这样重

视《诗》的原因了。

由上可知,赋诗风气是在“隐”的影响下产生的,它植根在古人重视谜语的基础之上。可以说,赋诗是在有诗书教养的士大夫间形成的一种特殊的、“雅致”的猜谜方法。

战国末年,儒学大师荀卿首先写作赋体,当与赋诗风气有关。他熟悉古时诸侯卿大夫间政治上的应对与酬酢,因此一定会熟悉赋诗这一惯例。他曾游学于齐,仕宦于楚,因此定然会受到两国好隐之风的影响。在他丰富的文化教养和社会经历的基础之上,也就酝酿出了一种新兴的文体——“赋”。

前人也已看到荀卿赋与隐之间的关系。《文心雕龙·谐隐》篇中说:“自魏代以来,颇非俳优,而君子嘲隐,化为谜语。‘谜’也者,回互其辞,使昏迷也。或体目文字,或图象品物,纤巧以弄思,浅察以衒辞,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显。荀卿《蚕赋》,已兆其体。至魏文、陈思,约而密之;高贵乡公,博举品物,虽有小巧,用乖远大。”刘勰举《蚕赋》为例,加以申述。这类作品都是“先疑其言以相问”,然后揭开谜底,与“隐”的原理完全一样。赋诗言志也以这种方式表现,这在荀卿当然是很熟悉的,他之所以以“赋”为名,看来就是受了前此盛行的赋诗之风的启示。

綜上所言,可以概括如下:赋这种文体,是在“隐”的影响下产生的;它的得名,则由赋诗之事而来。

荀卿是咏物小赋的首倡者,自此之后作者辈出。赋家把客观事物的具体形态细致地刻画出来,读者则从描绘的形象中享受其文学情趣,因此汉魏六朝都视咏物小赋为娱玩之具。

《汉书·枚皋传》:“〔皋〕从行至甘泉、雍、河东,东巡狩,封泰山,塞决河宣房,游观三辅离宫馆,临山泽弋猎,射馭狗马,蹴鞠刻镂,上有所感,辄使赋之。为文疾,受诏辄成,故所赋者多。”

《汉书·王褒传》:“上令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

《汉武故事》：“〔上〕好醉赋，每所行幸及奇兽异物，辄命相如等赋之。”（《太平御览》卷八八引）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杂赋”类载《杂鼓琴剑戏赋》十三篇、《杂山陵水泡云气雨旱赋》十六篇、《杂禽兽六畜昆虫赋》十八篇、《杂器械草木赋》三十三篇，说明汉代这类小赋的创作甚为繁荣。它们与荀卿赋之间有着继承与发展的关系，那在中间必然会有共同的特点。研究起来，这类咏物小赋在写作方法上有着明显的一致之处。

这里可举相传为西汉初期路乔如的《鹤赋》为例以说明之。

《西京杂记》卷四：“白鸟朱冠，鼓翼池干。举脩距而跃跃，奋皓翅之戢戢。宛脩颈而顾步，啄砂磧而相欢。岂忘赤霄之上，忽池籓而盘桓。饮清流而不举，食稻粱而未安。故知野禽野性，未脱笼樊；赖吾王之广爱，虽禽鸟兮抱恩，方腾骧而鸣舞，凭朱檻而为欢。”

和荀卿《蚕》、《箴》诸赋相比，可以看到，这类小赋都注意描摹事物外形，采取如实敷写的手法，很少运用比喻，也没有什么深的寄托寓意，因此从写作手法上说，它们主要是用六义中的“赋”写成的。

汉人总结《诗经》的创作成果，提出了“六义”之说。他们归纳出了赋、比、兴三种不同的写作方法。这并非《诗》中特有，其他文体也有应用，只是由于要求不同，因而各有偏重罢了。《诗》中用比、兴的地方比较多，但用赋的地方也不少，皇甫谧《三都赋序》曰：“诗人之作，杂有赋体”，也就是说诗人应用了赋这种手法。汉人在给这种手法命名时，定会联想到当时大量存在着的赋体上去；他们看到赋家用以写作的就是这种手法，因而径以赋为“六义”之一。这样的推断，应当是合乎情理的：“赋”这种手法的得名，当由赋体移用而来。

由此可知，“赋”之一词在文学领域中包含着三种不同的意义，

不加区别容易造成混乱,但中间确也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它的发展途径是:政治上的一种特殊风气影响到文学,产生一种相应的文体,然后形成一种具体的写作手法。

这里应作解释的是:屈原等人的作品为什么可以称之为“赋”?司马相如等人的大型作品为什么也以“赋”名?

刘向、班固等人称屈原的作品为赋,实则这种作品本无赋称,只有荀卿的作品才取名为“赋”,屈、宋的作品应该正称之为“楚辞”。然而自从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大赋产生之后,有人看到它与楚辞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也就顺口改称楚辞为赋罢了。

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篇中将大赋的写作范围归结为“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小赋的写作范围归结为“草区禽族,庶品杂类”,二者写作对象不同,写作要求不同,也就决定二者篇幅上有差异。但它们在写作手法上却无甚不同,主要都采用了六义中的“赋”法,不过由于描写对象及应用场合等条件不同,小赋的敷陈较有限制,大赋的敷陈更为淋漓尽致罢了。

枚乘作《七发》,为大赋不祧之祖,但不以赋名;所作小赋,当以接受荀卿影响之故,已以赋名篇。足见大“赋”之称本由小赋发展而来。其所以如此,如上所言,则以二者之间本来存在着共通之点,尤其是写作手法上的一致。

(原载《古典文学知识》1990年第4期)

赋体评议

—

古人写作重视文体的选择,各种文体之间又因社会功能的不同而隐然有高下之分。《文心雕龙·书记》篇叙及“笔札杂名,古今多品”,又总称之为“艺文之末品”;《杂文》篇则曰:“凡此三者(对问、七、连珠),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也。”可见这些文体的品位都不高。那么,在中国古代的各种文体中哪一种文体在文坛上占有高位呢?答曰:赋。

赋最受到人们的重视,这可从下列几个方面加以考察:

(一)“作赋需大才”

作家才性多有不同,专擅的文体也有不同,但若有人具有写作大赋的才能,则被视作大才,与擅长写作其他文体者有所不同。《北齐书·魏收传》曰:

〔收〕与济阴温子升、河间邢子才齐誉,世号三才。……收以温子升全不作赋,邢虽有一两首,又非所长,常云“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士。唯以章表碑志自许,此外更同儿戏”。

魏收此说是总结了前人和当代人的经验而提出的,后人从无异议,可知古代文士普遍认为赋这一种文体最能显示作者的水平,能够写作大赋的人才能被人称之为大才。

（二）总集、别集首列赋体

从传世的总集和别集来看，各人的文章按文体编排，除个别例外，如若干以诗著称的人首列诗体外，一般总是把赋列在全集之首。于此可见赋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

传世的总集以昭明《文选》为第一部，此书即将赋体列在各种文体之首。对于《文选》的文体区分，古今议之者颇多，“赋先于诗”，也遭到过章学诚等人的批评，^①但后人沿而不改，足见这样的编排还是反映了古今学术界的共通心理，所以才没有人起而改变或作调整。

萧统等人的文体安排也是前有所承的。考察历史，即可见其端倪。班固根据刘歆《七略》编纂《汉书·艺文志》，把西汉时期的诗赋作品收在《诗赋略》中，前列屈原等人之赋、陆贾等人之赋、孙卿等人之赋以及杂赋共四类，计为七十八家一千零四篇，后列歌诗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前赋后诗，说明这一格局在赋体形成之时即已确立；东汉之时赋作更盛，只是袁山松的《后汉书·艺文志》已佚，在此前后编纂东汉一代历史的其他各家看来没有这方面的记叙。范晔作《后汉书》，也无《艺文志》一类的文字，但他在纪传中，特别是在新辟的《文苑传》中，记下了许多著名文士和他们的作品，在文体的编排顺序上总是首列赋体，然后叙及其他文体，只有少数作家名下首列诗体。先诗后赋，也是赋从诗出的意思。这样的安排同样表现出了赋体的尊贵。

（三）文会、投献，作赋最能显示水平

钱起《赠阙下裴舍人》诗后四句曰：

.....

阳和不散穷途恨，霄汉长悬捧日心。

献赋十年犹未遇，羞将白发对华簪。

献赋可以得官，历代皆然，大家都熟知的，或许要以杜甫进献《三大礼赋》之事为最著名。杜甫入京求仕，屡次应试不中，又乏有

力者荐引,穷途末路,只能利用玄宗祠太清宫、太庙和祀南郊的机会,进献三赋,结果果然获得了玄宗的赏识,敕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由此走上了仕途。文人献赋得幸,表示自己有大才而得到了赏识,那是感到非常光彩的。杜甫日后流落西川,在《莫相疑行》中追忆道:“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烜赫,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往时文采动人主,此日饥寒趋路旁。”可见杜甫虽以诗歌享有盛誉,但他最引为骄傲的,是献赋而入仕之事。

文人集会,联章赋诗,分题限韵,这些古人视作文采风流的雅事,可以博得盛誉,但不一定会被视作大才。然而文士若能在盛会之时当场作赋,则被认为大才的表现,例如《后汉书·祢衡传》叙其即席作《鹦鹉赋》,《三国志·魏书·陈思王传》叙曹植应命而作《铜雀台赋》均是。

文士投献赋篇而得赏识,即兴作赋而得盛誉,李调元《赋话》中事例甚多,可以参看。

(四) 古人重赋原因之分析

上述种种,史籍多见,不烦备举。值得探究的是:为什么古人会有这种观念,把赋推上文体中首要的地位?从赋本身来看,究竟具有怎样的特点才能引起人们这么重视?

近人于此已经取得了很多可贵的研究成果。郭绍虞说:“中国文学中有一种特殊的体制就是‘赋’。中国文学上的分类,一向分为诗文二体,而赋的体裁则界于诗文二者之间,既不能归入于文,又不能列之于诗。可是,同时另有一种相反情形,赋既为文,又可称之为诗,成为文学上属于两栖的一类。”^②这就是说:赋是一种将韵文和散文综合起来的文体。赋家需有散文作家和韵文作家的特长,因而常是受到人们的好评。

比之其他文体,赋家在沈思、翰藻方面要下更大的功夫,完美的大赋,在二者的结合上更见功力。王芑孙《读赋卮言·立意》曰:“寻其脉络,须兼叙事之长;极尔精详,更有补题之解。功以琢磨而致,思必再四而周。古人或炼之以十年,或研之于一纪,非为徵材,良由审意,作赋之功,固以淹迟极妙也。”有的大赋就像一部专题的

辞典,前人早有赋起类书作用的观点,宋代吴淑作《事类赋》百篇,太宗诏令注释,遂成《事类赋注》三十卷。这样的赋也有欠缺,算不上完美之作。刘熙载《艺概·赋概》曰:“赋与谱录不同。谱录惟取志物,而无情可言,无采可发,则如数他家之宝,无关己事。以赋体视之,孰为亲切且尊异耶?”这就是说极尔精详的大赋必须具备情采之美,才能算是成功之作。

但古人之重赋,还在于它是一种学术和文学高度渗透的文体。我国古代学术最重博综,评价人物时最重博学多能,赋家兼有学术和文学之长,才会被人视作大才。我以为这是历代重赋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我国古代早有“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的说法,^③后人不一定知道此语出处,但都接受这种观念,以为儒者(广泛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应当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章回小说中形容某位能人时,总是称赞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三教九流,诸子百家,无所不通,无所不晓”。而对于那些专精一艺或一技的专家学者,则常持菲薄的态度,或讥之曰雕虫小技,或称之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是读过一些古书的人都会接触到的道理。

但时代是在不断发展的,先秦时期学术融而未分,例如战国诸子,既是哲学家,又是文学家,有的还是著名的教育家、科学家、政治家……后人很难将之纳入某一范畴之中。战国之末,屈原等人在文学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但视其平生建树,仍难以文人视之。汉代辞赋繁荣,于是刘歆等人另立“诗赋略”,藉与“诸子略”等区分;东汉出现了更多的专业文人,于是范曄在编纂《后汉书》时首创“文苑”一“传”,藉与“儒林”等“传”区分。这是顺应时代发展而采取的正确措施。随着社会的发展,学术上的积累越发丰厚,人们的分工越发细密,必然会有一批人去从事某一专业的创造,这样才能加快这些专业的建设,促进社会更快的发展。范曄等人的创建,一直为后代史家所沿用,说明这是符合历史要求的正确措施。

但事情又有它的另一方面,有人则起而反对这样的区分。这里有传统的观念在起反拨作用。

《庄子·应帝王》中有文曰：

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这则寓言可以用来说明人们在智力发展破坏了学术高度综合状态之后所感到的惋惜情绪。文学发展之后，随之也出现了很多怪怨的言论，袁枚《虞东先生文集序》曰：“文章始于六经，而范史以谈经者入‘儒林’，不入‘文苑’，似强为区分，然后世史家俱仍之而不变，则亦有所不得已也。”可见思想豁达如袁枚，对此也有无奈而惋惜的情绪。

王先谦《后汉书集解》于此书《文苑传》后猛烈批评范曄首创该传，云“所传者，大率恃才傲物，浅中小夫，未闻君子之大道，异乎游夏文学之科矣。……自后史臣载笔，踵而弗失，无行才士，率厕兹传，文人之目，遂为世诟，流宕忘返，君子惧旃。刘摯尝言‘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叶适亦谓文不足关世教，虽工无益”。这里所说的“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云云，也已成为古人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见解。

根据儒家的正统观点，以为文人要成大才，必须要有器识，器识从何而来，当然要从学问着手。只有学养深厚的人才能创作出有关世教而又完美无缺的作品。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饱学之士是否算是完美无缺的人物了呢？这也不尽然。书虫、书橱、书簏云云，经常用来讽刺那些博学而不善属文的人。李善的《文选注》，向被学界视为博学的典范之作，但李善生前生后都曾遭到人们的非议，《新唐书·李邕传》曰：“父善，有雅行，淹贯古今，不能属辞，故人号‘书簏’。”显然，这也是一件颇使人感到遗憾的事。

综合上言，可知我国古代那些博学和文词兼擅的人物，最被人

推崇。谢榛《四溟诗话》卷二曰：“汉人作赋，必读万卷书，以养胸次。《离骚》为主，《山海经》、《舆地志》、《尔雅》诸书为辅；又必精于六书，识所从来，自能作用，若扬旆、戍削、飞襪、垂髻之类，命意宏博，措词富丽，千汇万状，出有人无，气贯一篇，意归数语，此长卿所以大过人者也。”自从汉初司马相如为大赋的创作奠定了体制方面的规格之后，后代著名的文士一直为此而努力，绵延至于近代，仍然如此。章炳麟（太炎）也有赋篇传世。章氏门人，如徐震（哲东）作有《游峨眉山赋》，^④黄侃（季刚）作有《宫沟秋莲赋》，^⑤都曾传诵一时。黄侃歿后，挚友胡小石教授撰挽联曰“所学兼儒林、文苑之长”，这是知识界对文学之士所能作出的最高赞誉。

儒学、文苑兼长的人物采用赋体创作，十八般武艺都能用上，最能发挥其水平。刘熙载《艺概·赋概》曰“赋兼才学”，这比各有偏至的人自然更为胜过一筹。

那些学识博大的著名文人，总是念念不忘他们的赋作，周辉《清波杂志》卷二曰：

东坡在海外，语其子过曰：“我决不为海外人，近日颇觉有还中州气象。”乃涤砚焚香，写平生所作八赋，当不脱误一字以卜之。写毕，大喜曰：“我归无疑矣。”后数日，廉州之命至。八赋墨迹初归梁师成，后入禁中。^⑥

东坡博学多能，著述之富，史不多见，而他在众多文体中独举八赋以卜生还的机缘，当是以为八赋乃其生平精神之所凝聚，可以以此觐测生气是否充溢，于此可见东坡之于赋作，真可谓生死以之的了。

二

有的学者看法与上不同，认为赋体向来受人鄙薄，他们所举的例证，不出下列数端：